

翻译理论与实践

编者按:《翻译研究》从以前的二级栏目跃升为一级栏目,旨在增加翻译理论建构和实践探索成果的发
文量。在全球化浪潮不断推进的今天,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成为人际交往的主要方式。同时,翻译行为
具有复杂性、动态性,需要多维度探索与实践。本栏目正是这一理念的尝试性践行:胡安江先生的成果
看似古旧,实是翻译理论研究的崭新探幽;朱安博、柳晓辉、刘明东三位老师则是从偏离翻译研究的主流
渠道,实施有价值的探索。规则须要遵从,但不应该拘泥。对规则的违反,或许意味着可能创新。

中国古代旅行书写与翻译研究的传统角色^{*}

胡安江

(南京大学,南京 210093;四川外语学院,重庆 400031)

提 要:如果旅行可以用来说明各种类型的转换和变迁,那么包含语言转换和地理位移的翻译无疑就是最具代表性的
旅行喻词。20世纪以来的文化研究对于旅行书写的兴趣,主要是从权力、话语、女性主义、族群理论和后殖民主义等
视角解读具体的旅行叙事。这样的研究固然有意义,但如果能从旅行书写发展与嬗变的历史坐标出发考察其类似
物——翻译与翻译者地位的形成与变迁,对于二者的认识毫无疑问可以进一步深化。

关键词:古代中国;旅行书写;翻译研究;传统角色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0)01-0113-5

Travel Writings and Role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Ancient China

Hu An-jiang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1, China)

Since travel could be used to explicate transformations and transitions of all sorts, translation, which presupposes not only
spatial displacement but also transitions of both form and content, is, undoubtedly, the most common source of metaphors of travel. The cultural studies in the 20th century centers the travel writings mostly on the specific travels in terms of power, discourse, feminism, race and postcolonism, which, though instructive, could be more significant if the travel writings and its analogue, i.e. translation, could be researched from the historical point of view.

Key words: ancient China; travel writings; translation studies; traditional roles

与旅行一样,“翻译”的词源不仅包含空间位移,而且和所有的旅行喻词一样,“翻译”也代表着某种意义上的转换,只不过这里的转换专指两种语言或者两种文化之间的转换。文本从一个地方迁移至另一个陌生地,然后该出发文本被另一种语言转化成目的地的通行文本,这样的旅行方式既有空间位移,也有形式和内容方面的转化。

事实上,翻译就是一种另类的旅行方式,是从一个文本到另一个文本、从主方文化(host culture)去往作为他者的客方文化(guest culture)的一次旅行。(胡安江 2007: 119)换言之,“语言作为一种世界观,首先是因为语言构成人的最重要的文化环境,直接塑造了人的文化心理,语言是我们感知、认识和理解世界的形式,人是按照自己的语言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寒山诗:文本旅行与经典建构》(07XWW003)的阶段性成果。

形式来接受世界的”。(包通法 2008: 121)

1 “旅行”词源辨

在中国古代旅行书写中,“旅行”一词有着多种不同的释义,在不同历史时期,总被赋予不同的思想内涵。在中国古代典籍里,“旅行”作为复合词开始使用大概可以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意思是“集体出行”。《礼记·曾子问》就有“三年之丧,练不群立,不旅行”的记载,其中的“旅行”即指“群行,结伴而行”。汉代刘向的《说苑·辨物》中也有类似说法,如“麒麟……不群居,不旅行”。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旅行”言说方式,主要是因为在中国古代,除极少数人(如帝王、官吏、学问家、商贾和僧侣)有个体旅行机会外,大规模的个体旅行活动是罕见的。事实上,由于生产和生活条件的限制,早期人类的诸多事务还只能依靠整个部落或者是一个部落中的几个家族群体的集体力量来解决。当然,任何迁居别处的“旅行”方式,在当时也只能是一种集体的迁徙行为。而这种旅行和迁徙行为的主要目的,就是寻求更好的生产和生活环境。

不过,复合词“旅行”的出现明显晚于作为单字的“旅”和“行”。事实上,“旅”与“行”最初是作为两个彼此独立但又相互指涉的词使用的。“旅”最早指军队的编制单位。《周记·地官·小司徒》载:“乃会万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故汉代文字学者许慎的《说文解字》有“军之五百人为旅”的说法。如此,也就出现了所谓“行旅”概念,其用意显然与“军戎”有关。梁昭明太子萧统(501-531)所编《文选》的卷 26 和卷 27 的行旅诗也主要以此类“载离多悲心,感物情凄恻”(陆士衡)以及“眇默轨路长,憔悴征戎勤”(颜延年)的“军戎”题材为主。可见,古代中国人“旅行”的另一目的实际上就是征战。

后来,“旅”又慢慢衍演出“道路、路途”的意思,如《书·禹贡》所载的“蔡蒙旅平”。王引之《经义述闻·尚书上》疏之曰:“余谓旅,道也。《尔雅》:‘路,旅,途也’……而《周易》所记‘旅,小亨,旅贞吉’的说法已颇类似‘旅’的今日用法。唐代孔颖达《周易正义》注疏曰:‘旅者,客寄之名,羁旅之称,失其本居,而寄他方,谓之为旅。既

为羁旅,苟求仅存,虽得自通,非甚光大,故旅之为义,小亨而已,故曰‘旅,小亨’。羁旅而获小亨,是旅之正吉,故曰‘旅,贞吉也。’”(孔颖达 2004: 516)如今,比较成熟的“旅”的现代意义包括:“寄居外地,旅居”、“寄居外地或旅行在途的人,旅人”和“行进到某一区域而暂作停留,在途中,旅途”等。

与“旅”相仿,“行”最初指作为名词的“道路”,如《诗经·幽风·七月》之“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不过,作为动词意义的“行”也见于《易·小畜》,如其“风行天上”中的“行”即指“流动、流通”;而《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中“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之“行”则指“传布、散布”之意。到了汉代,《说文解字》释“行”为“人之步趋也”,“行”作为动词的功能始著。汉阮瑀《为曹公作书与孙权》之“疫旱并行,人并减损”(“流行、流传”)和清厉鄂《晚步》诗之“水光知月出,花落见风行”(“流动、流通”)便是很好的例证。

其实,“旅”、“行”的词义重心最终体现于“行”这一表达地理位移的概念中。然而,古代中国始终无意主动践行之,趋附之。相反,人们始终坚信“安居”方能“乐业”。因此,除非生产和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如战争)或者政府移民政策(如民族融合和水利工程)的驱使,否则“背井离乡”总会让人唏嘘慨叹。在中国古人看来,“旅行”决不是一种愉悦的身心体验,相反它包含太多难以化开的痛苦记忆。其悲苦和艰辛反映到中国古代旅行书写中,则构成中国古代旅行文化最重要的两大主题:“离人泪”和“征夫泪”。中国古代最早的伤感文学、东汉后期的《古诗十九首》和唐代大量的行旅诗、边塞诗即是其重要标志。

除了“旅行”和“行旅”外,在中国旅行书写中,还不能忽略概念“游”。许慎《说文解字》释“游”为“旌旗之流也”,即古代旌旗上附着之飘带。《左传·桓公二年》也有“藻、率、革音、鞞、鞶、历、游、纓,昭其数也”的记载。显然,如“旅”、“行”一样,早期的“游”或多或少也和戎旅征战相关联。后来,在“行走”和“运行”等基本意义基础上,“游”衍生出“遨游、游览”的意思。《庄子》一书中即有不少这样的表达法,如《庄子·知北游》中的“知北游于玄水之上”以及《庄子·秋水》中的“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等。此外,《庄子》

描绘的道家“饱食而敖游,汎若不系之舟,虚而敖游者也”的“上浮于风,下游于水”的“逍遥游”状态更是千百年来人们梦寐以求的“游”的最高境界。魏文帝曹丕(187-226)的《芙蓉池作》就有“遨游快心意,保已终百年”的佳句。

尽管中国人有“安土重迁”的倾向,但龚鹏程认为,其精神中也有游的一面。中国的古代社会是一个充满各类游人流民以及游之活动的世界。游的精神体现在中国社会文化的各种层面和各个领域。概念“游”不仅“体现于游戏、游旅、游艺、游心、游观、游学、游仙等各种活动中,也与社会上的游民、游士、游侠、流氓、游娼等等人士有关”(龚鹏程 2001: 5)。郭少棠据此认为,作为“旅行”方式之一的“旅游”中的“游”是中国旅行文化的关键和核心概念,因为“游”字反映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某些特性(郭少棠 2005: 44)。不过,从龚鹏程描述的“游”的各类形式和“游”的构成主体看,“游”文化在中国古代旅行书写中仍然不居主流。

2 中国古代翻译研究的传统角色

事实上,汉语“行”包含的“道路”、“流动、流通”、“传布、散布”、“流行、流传”等概念无疑可以用来概括文本旅行的整个过程及最佳范式:文本沿着一定的“道路”(线路)“流动”、“流通”与“传布”,最后得以“流传”和“接受”。当然,这是文本旅行过程中最为理想的一种模式,而且一旦条件成熟,旅行文本可能在客居国建构其经典地位。于是,中国古代“行”的意义的历史嬗变为作为文本旅行方式的翻译作了最好的注解。

从翻译研究的视角来看,“旅”后来衍生出的“道路”、“路途”之意以及《周易》所记“旅,小亨,旅贞吉”的说法,一方面昭示文本旅行在路途中可能遭遇的“颠簸”和“风险”;另一方面,这样的说法与中国古代翻译文本以及翻译者地位的传统描述也正好不谋而合。如旅者一样,文本从始发地一路颠簸,经历一段时空旅行之后到达客居地,由于“失其本居,而寄他方”,因此翻译文本只能落得个“苟求仅存”的命运。译本和译者的地位在道德家们看来不过是“虽得自通,非甚光大”。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规范中,“翻译”的传统角色正如《周易》对于“旅”的描摹一样,不过是“小

亨”、“小道”而已。最典型的莫过《大戴礼记》中所载“小辨”说:“公曰:‘寡人欲学小辨,以观于政,其可乎?子曰:‘否,不可。社稷之主爱日,日不可得,学不可以辨。是故昔者先王学齐大道,以观于政。天子学乐辨风,制礼以行政;诸侯学礼辨官政以行事,以尊天子;大夫学德别义,矜行以事君;士学顺,辨言以遂志;庶人听长辨禁,农以力行。如此,犹恐不济,奈何其小辨乎?’”

此外,翻译的这种“边缘角色”在当时人们对于译者的称谓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春秋时期史学家左丘明(公元前 556 - 451?)在《国语·周语》中便记载周朝负责与外族沟通交流事务之“舌人”及其卑微的群体形象:“夫戎、狄,冒没轻儻,贪而不让。其血气不治,若禽兽焉。其适来班贡,不俟馨香嘉味,故坐诸门外,而使舌人体委与之。”“舌人除从事口译之外,还兼做“仆人的差事。据钱锺书考证,中国古代也有以“牵马”谓译者的例子。事实上,《周礼》中记载的译官“象胥”和后来古籍中频繁出现的“寄”、“象”、“狄鞮”、“译”等“译者”群像,都不过是古代职官体系中不入流的官阶。这一个“边缘群体”从事的工作其实就是被孔子讥为“小辨”的译事。有论者评论说,这些文献表明,在秦代以前,翻译基本上还是一种自发的行为,不是出于对另一种语言和文化的好奇。翻译的出现是因为国家有了管理和交流的需要,后来体制化为一种无足轻重的政府岗位,对某些人而言,它同时还是一种谋生的手段。(Martha 2006: 46)

3 中国古代旅行书写与翻译研究

罗拉丹那·普拉热(Loredana Polezzi)论述道,“旅行书写传统与翻译一样,长期以来都为一种所谓的忠实和客观(旅行者是目击证人)的迷思所笼罩,然而实际上它是依据特定的意识形态和等级序列(hierarchies)来阐释和表现现实的”(Polezzi 1998: 322)。从这个意义上讲,旅行与翻译,旅行者与译者在一个国家的文化多元系统中的角色和地位一方面相辅相成,另一方面均会受制于特定的文化多元系统。

首先,社会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旅行和翻译或中心或边缘的地位。中国古代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和各种政治、经济、宗法力量,使得各

个时期的中国人普遍具有一种“安土重迁”的思想。中国人视“安土重迁”为其人生态度,“故精神上趋于保守,伤离别、嗟沦谪、哀流亡、叹迁贬,而自安于其以礼俗宗法维系之田园乡土社会”(龚鹏程 2001: 5)。他们还推崇如《老子》所说,“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音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人生境界。于是,不夸张地说,“安土重迁”与“安居乐俗”就是当时中国社会文化的最显著特点,因此它们成为制约中国旅行文化现代化进程的最重要因素。

实际上,正是这样的文化心态以及“安土重迁”的社会意识形态使得古代中国长期将自己封锁起来,无法走出自己设定的文化封闭圈。这种心理投射在文化态度和翻译事业上,便呈现出保守和守旧的成份,对于异己文化也多持观望、怀疑、排斥和不信任态度,有悖于传统势力认可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传统的精神产品就很难登上大雅之堂。体制内如此,对于体制边缘的翻译以及翻译文本的限制就更加严苛。诚如张佩瑶对于周朝文化心态的描述:自认为“文明开化”的周朝人对当时的其他族群没有任何了解的欲望,更别让他们讲异族的语言了。他们的地理观念坚守一种信念:已知世界的其他部族和人种还没有培养出对于礼乐的认知,因而几乎没有人愿意与这些部族和人种进行任何实质性的接触和互动。

(Martha 2006: 44)在大一统的秦汉帝国建立后,各地的文化交流更是放慢了速度。特别是对域外来说,中国的传统思想和传统文化从未因西方思想文化的传入而改变它的基本格调。(马洪路 1998: 9)

其次,等级序列的泾渭分明决定了旅行与翻译的实际地位。从中国古代典籍和历史上的文化事件来看,“旅”、“行”、“游”在中国传统文化心理中的这种非主流状态决定了古代“旅行”文化的边缘地位,而这种边缘角色使得当时“在路上”的行路人的数量相对现代意义的大众旅游而言,可谓寥若晨星。实际上,行路的主体多为社会下层或者不得志、不得势的各界人士。这种地理位移上的相对封闭性使得翻译承载的沟通与交流功能黯然失色,于是作为沟通与交流媒介的译者就难以进入主流文化的视野。再加之上述“大汉族

中心主义”与“大汉族优越论”思想的冲击,使得在佛经翻译开始之前的很长一段时期内,翻译活动都仅限于政府事务的需要。尽管它对政府运作有用,但通常不会进入文化精英阶层的注意范围。具体到翻译研究领域,中国早期典籍中的“象胥而朝”、“重译而朝”、“越裳重译”的记载就代表某种“上邦”文化心态。孔慧怡认为,如此推崇“重译”,是因为它代表中国国威远播,遥远的外邦也因此要排除万难,到天朝朝贡。对中国主流而言,外邦是否能用语言表达讯息并不重要,因为表达的困难是外邦(不是中国)要解决的问题,困难愈大,代表外邦来自愈遥远的地方,也就愈能显示中国的国威。孔慧怡认为,在这种文化心态影响下,翻译是否有效率,并不为历史上中国主流关注。

(孔慧怡 2005: 25)因此,使用源语和译语外的第三种或第四种语言传递信息的“重译”就成了中国古代官场和知识界的普遍期待。于是,翻译的重要性长期以来遭受主流文化的压制、扼杀。这样,翻译和译者的地位自然如古代旅行和旅行者的形象一样,处于本土文化多元系统的边缘。

因此,历史上很多朝代都依赖外邦人或新迁徙到中国的非中国人群担任翻译任务。有论者分析这种情况说,中国传统翻译活动没有出现过大量本土译者,与翻译活动没有进入主流文化有直接关系(孔慧怡 2000: 30)。事实上,早期的佛经翻译和时政翻译等多以外族人为主导。而对于本土翻译人才的培养因为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传统对于翻译事业的贬抑,长期以来都难于提上正式议程,这种情况大致维持到 1862 年同文馆的建立。而且,由于外族译者的特殊身份,历朝各代的译者职位一直低微卑下,译官因此成为事实上的不入流职制。于是,正统的“大汉族”知识分子耻于为译,偶有为之,也仅为糊口之需。如此,翻译引起的文本旅行事件如同中国古人害怕“旅行”一样,少得可怜。于是,译事艰难。文本因此既不容易旅行出境,也不容易有异域文本旅行入境。

再次,客观地理环境和交通状况的限制也决定旅行文化与翻译事业的历史命运。中国古代旅行文化不居主流的原因之一就是交通不便。古代的陆路交通和水路交通相对而言比较落后,“行路难”因此成为当时旅人的共同心声。而且,旅途中的风险和安全也是旅者最为关注的问题,如

《周易》中的“旅琐琐，斯其所取灾”、“旅焚其次，丧其童仆”以及“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等均谈论旅途中的安全和风险问题。这样，古人为亲友临行前的饯行总是充满种种忧郁和悲凉的色彩。当然，交通不便其实也是因为古中国重农轻商政策的结果。总之，这种地理交通状况势必会影响新知识与新信息的传播与接受。《尚书大传》就有“道路悠远山川阻隔，音使不通，故重译而朝”的记载。而东汉末年至两晋时期的“西域”地区之所以会成为贸易和文化的集散地，就是因为其优良的地理条件和交通要道的优势。频繁的移民使得西域地区成了一个接触和交流新思想和新知识的地方，同时，该地区来来往往的旅人营造的“南腔北调”的多语环境也为翻译事业的兴盛和杰出译才的出现创造了契机。事实上，西域译者在当时的佛经翻译中的贡献最大。

4 结束语

“翻译是一种文化交际行为”（彭爱和 伍先禄 2008: 131），是一种跨文化的旅行。如果旅行可以用来说明各种类型的转换和变迁，那么包含语言转换和地理位移的翻译无疑就是最具代表性的旅行喻词。20世纪以来的文化研究对于旅行书写的兴趣，主要是从权力、话语、女性主义、族群理论和后殖民主义等视角解读具体的旅行叙事。这种研究固然有意义，但如果能从旅行书写发展与嬗变的历史坐标出发考察其类似物——翻译与翻译者的地位的形成与变迁，对于二者的认识无疑可以进一步深化。

同时，翻译是一种目的性旅行。目的“对翻

译策略选择”起“决定作用”（梅晓娟 2008: 130），因此目的性是旅行翻译的一个重要论题。

参考文献

- 包通法. 论汉典籍哲学形态身份标识的跨文化传播[J]. 外语学刊, 2008(2).
- 龚鹏程. 游的精神文化史论[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 郭少棠. 旅行:跨文化想象[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胡安江. 文本旅行与翻译研究[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7(5).
- 孔慧怡. 亚洲翻译传统与现代动向[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 孔慧怡. 重写翻译史[M]. 香港: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 2005.
- 孔颖达. 周易正义[M].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04.
- 马洪路 刘凤书. 古道悠悠——中国交通考古录[M].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8.
- 梅晓娟. 翻译目的与翻译策略的选择[J]. 外语学刊, 2008(2).
- 彭爱和 伍先禄. 论文化中心主义对中西跨文化翻译的操纵[J]. 外语学刊, 2008(1).
- Enzensberger, Hans Magnus. A Theory of Tourism[J]. *New German Critique*, Special Issue on Literature. Spring-Summer, 1996(68).
- Martha, Cheung.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Discourse on Translation: From Earliest Times to the Buddhist Project (Vol 1)* [M].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2006.
- Polezzi, Loredana. Rewriting Tibet: Italian Travellers in English Translation[J]. *The Translator*, 1998(2).

收稿日期: 2008 - 05 - 10

【责任编辑 李洪儒】